

论沃斯特与邦尼菲尔德对沙尘暴的不同解读

高祥峪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20世纪30年代,沙尘暴笼罩着美国大平原地区。沃斯特认为沙尘暴爆发的根源是该地区农场主所持的文化价值观,邦尼菲尔德则认为是错误的生产技术导致了沙尘暴;沃斯特认为联邦政府所采取的治理措施力度不够,邦尼菲尔德则认为联邦政府治理沙尘暴的目的是诱使农场主改变生产模式。笔者认为,二人的观点各有偏颇,应该把沙尘暴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中加以综合考察。

[关键词]沙尘暴;沃斯特;邦尼菲尔德

[中图分类号]K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22-0016-03

20世纪30年代,滚滚沙尘暴笼罩着美国大平原,记者罗伯特·盖格在实地考察后给重灾区起了一个诨名“Dust Bowl”,这个概念被美国官方所认可,它包括“堪萨斯西部的三分之一,科罗拉多的东南部,俄克拉荷马的锅把尔区,德克萨斯锅把儿区北部的三分之二,以及新墨西哥的东北部”。^①大平原的居民们在灾难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联邦政府为了治理这一生态灾难采取了多项措施。在学术研究领域,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和保罗·邦尼菲尔德考察了这一自然灾难后,对沙尘暴的起因和联邦政府的治理措施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与评价。本文旨在探讨沃斯特和邦尼菲尔德两人观点之异同。

一

沙尘暴的爆发与大平原独特的自然环境有关。大平原位于美国中部,因为年均降雨量不足而不利于农场的发展,在美国内战之前,美国官方和民间均视其为大荒漠。其实,它是一片生态相对稳定的草原地带,印地安人曾在那里猎食美洲野牛。美国内战之后,白人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大平原地区,几经周折,到了20世纪初,农作农业基本上在大平原地区扎下了根。但是这种农耕业的发展有其潜在的危险。在沙尘暴地区,土壤的结构比较特殊。它是由微小的土壤颗粒粘结在一起,最终形成的土壤颇似“鱼卵”。^②这种土壤的结构比较稀松,“一旦失去粘性,土壤颗粒就会散架成更小的颗粒,这些颗粒就易于随风而逝成为沙尘暴”。^③因此,水分或降雨对这种土壤保持正常的结构非常重要,干旱会对这种土壤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西进运动时期开始大规模地开发大平原,该地区的

气候正处于长时期降雨周期,居民们拥有天时之便。这种天时不大稳定,到了20世纪30年代,大平原的气候则处于长时期干旱周期,到了30年代末、40年代初,降雨周期才再次来临。

由于低降雨量不能完全满足农作物需要,大平原居民积极利用技术来开发地利之便:一方面,他们使用哈迪·坎贝尔发明的“旱作农业”,实施秋季深耕、夏季休耕的方法,^④这等于变相地增加了降雨量;另一方面,大平原的农业开发虽然起步比较晚,但遇上了农业生产实现机械化的潮流,特别是在20年代,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农场主借助机械化的力量以惊人的速度开垦着大平原,原先适应该地区生态环境的草地不仅迅速消失,而且剩余草地上的牲畜数量也不断增多。

到了30年代,大平原的气候发生重大变迁,一个长期的干旱周期出现后,失去草地保护的土壤在高温中失去水分散成细小颗粒,在狂风的带动下成为沙尘暴,沙尘暴带走了大平原最基本的财富——土壤。“沙尘暴从大平原带走的泥土是开凿巴拿马运河时人和机器掘出的两倍,这些泥土又一次沉积在整个东部沿海各州和大西洋里。”^⑤

二

沃斯特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来解析沙尘暴的起因及其治理,有一种生态价值观包括三方面的内容:“自然必须被当作资本……自然的机能上的相互依赖性在这种经济核算中也被打了折扣,为了自身不断地进步,人有一种权利,甚至是义务去利用这个资本,社会制度应该允许和鼓励这种持续不断的个人财富的增长。”^⑥这是优先考虑追求利润而忽视大自然的生态性,这种谋利

的冲动不受任何约束。在这种生态价值观的指导下，原本生态稳定的大平原被农场主开垦成生态脆弱的小麦王国，从而导致了 30 年代沙尘暴的爆发。沃斯特对农场主的这种文化观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认为“正是文化之手把人的天性琢磨出来，从而赋予历史以多样性。而文化正是造成尘暴的主要原因”。^⑦农场主和大平原成了这种生态观的牺牲品。

在这场大灾难中，大平原失去了土壤，失去了庄稼；有些农场主流离到加利福尼亚，有些居民因为沙尘暴引起的疾病而失去了生命。在失去了这么多之后，大平原人仍然没有改变旧的思维观念，他们远未认识到沙尘暴的深远影响，沃斯特承认：“必须肯定，态度上的改变确实发生过，但在肮脏的 30 年代，最难以置信的事实是布尔乔亚式乐观主义的冥顽不化及其对所有警告的无动于衷。”^⑧

沃斯特在思考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时并非泛泛而谈，而是利用个案进行实证研究，他考察了沙尘暴地区的哈斯克尔县后认为，该县的居民并未形成了解自己的土地、热爱自己的土地的地方感，因为他们的生活观是受大城市的影响，并没实事求是地形成自己社区的生活节奏。^⑨与之相对照，沃斯特又着重考察了门诺教徒们的生活方式，门诺教徒对消费相对克制，结果，他们在 30 年代受到的打击稍轻。^⑩总体上，大平原的居民并不推崇一种能自我约束、能优先考虑生态性的资本主义商业文化，他们始终没有建立起与土地和谐相处的关系。

沃斯特对联邦政府治理沙尘暴所取得的成果评价不高。这一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任总统，他具有资源保护意识。在行政部门中具体处理沙尘暴事宜的官员有休·哈蒙德·贝内特和刘易斯·塞西尔·格雷等，他们的思想和罗斯福总统一致，也属于资源保护主义。实际上，“资源保护意味着最好的东西让最多的人使用最长的时间”。^⑪它着眼于如何谨慎、有计划地开发和使用自然资源；它承认发展，认可开发活动。它并未把人与土地置于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生态圈内加以考察。它是把理性纳入到对开发活动的指导中，但是并未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出根本质疑。这些资源保护主义者与大平原农场主的区别在于他们对开发活动持更加克制的态度。

联邦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治理政策：1934 年，通过了《泰勒放牧法》，停止了宅地对公共土地的侵占并对公共草原上的放牧活动进行调控；收购了一些不宜耕种的土地，在这些贫瘠的地里植草；建立了水土保持局，鼓励建立水土保持区，推广保持水土的技术……上述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大平原农场主的生态价值观。在此期间，联邦政府于 1936 年推出了报告《大平原的未来》，“报告认为，土地的破坏基本上是一种‘思

想态度’的结果——必须通过某种方式使他们得以改变”。^⑫联邦政府最终却把沙尘暴的起因归根于耕作技术问题而忽视了该建议。

三

沃斯特对大平原农场主的遭遇持怜悯的态度，但又批判其所持的文化观，而邦尼菲尔德却非如此，在他的笔下，农场主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在灾难面前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他把沙尘暴的起因归根于技术问题。为了保持水分而推行的夏季休耕要求部分土地退出生产，结果农场主开垦了更多的土地来弥补休耕带来的损失，^⑬总体上，在沙尘暴爆发之前，农业研究机构和专家已经注意到了土壤侵蚀的问题，但主要关注水土侵蚀问题，并未关注日后沙尘暴带来的风蚀问题，结果，农场主被自然灾害打了个措手不及。^⑭在诸多技术问题中，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是引起沙尘暴的重要原因，它使农场主有能力大面积地开垦大平原。^⑮此外，开垦土地的单向犁对沙尘暴的爆发也难辞其咎，这种犁破坏了土壤的内部组织结构，结果，“因为大多数开垦活动发生在 30 年代干旱之前的一些岁月里，土壤和土壤机能并未适应新环境。于是，当大危机和干旱来临时土壤就非常易于遭受风蚀”。^⑯这样，是错误的农作技术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农场主反而置身于无辜的境地。沙尘暴的起因确实与技术问题有关，但技术是由农场主所操作，农场主是置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开展活动的，邦尼菲尔德只是探讨了市场对大平原选择生产小麦的推动力，^⑰却未把这种经济体系作为沙尘暴爆发的根本原因。

沃斯特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平原农业经济的发展上，邦尼菲尔德则视野开阔，其考察范围涵盖整个大平原的经济发展。这种综合、宽广的考察视野使他对大危机中沙尘暴地区的经济发展得出了惊人的结论，他以该地区的银行业、报业、邮局变迁、学校教育的发展、与农业相关的商业、汽车销售业、土地价值、石油业和铁路发展等为考察目标，认为这些产业在 30 年代的发展相当强劲，因此，大平原的经济形势与同一时期的全国其他地区相比，情况不是特别坏。^⑱正因如此，尽管让大平原居民印象深刻的沙尘暴大灾难——黑色星期日是发生在 1935 年 4 月 14 日，但是邦尼菲尔德认为，1933 年因为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交织在一起反而是大平原最艰苦的一年。^⑲

在对待联邦政府治理沙尘暴的问题上，邦尼菲尔德站在农场主一边，对联邦政府的治理措施持批评态度。他的思路是：格雷在 20 年代曾主张对土地进行分类，并依此发展适于各类土地的农业，按照该理论，大平原应该退出小麦生产，转而从事放牧业，罗斯福总统在

青海发现明代修筑长城题记考辨

閻 璞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青海 西宁 810007)

[摘要]长城是中国古代一项伟大的军事工程。明代为抵御西海蒙古的人侵,环西宁卫大修长城、边塞。历经几百年的风雨沧桑,大部分长城墙体坍塌、壕堑淤塞,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人们凭吊历史的对象,而参与修筑长城的民众也与长城的军事功能一道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2008年进行的明长城资源调查中,在青海省湟中县上新庄镇上新庄村南的贵德峡内石壁上发现了一处修筑长城墨书题记(以下简称题记),是青海省乃至全国发现的为数不多的修筑长城的题记,对于了解青海长城修筑、民族变迁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贵德峡;墨书题记;明长城

[中图分类号]K87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22-0018-04

一、贵德峡及其所发现题记、长城的基本情况

贵德峡，又作归德州峡、水峡等，位于拉脊山中。此山的峡谷多为天然的通道，“察斯山（拉脊山）之峡谷，

处理沙尘暴问题时支持该想法；于是，联邦政府的一系列治理政策就变了质，不论是农业调整署的资助、人口再安置署的资助还是组织农场主参加水土保持区和收购贫瘠的土地等项目，这些措施的最终目的都是引诱农场主顺从土地分类利用的计划。^②农场主不仅要反对自然灾害，还要反对联邦政府的阴谋。联邦政府在治理沙尘暴时受资源保护主义思想的影响，确实有鼓励该地区发展牧业的想法，但整体上该计划并未取得成效，联邦政府更多的治理措施是采用技术手段来引导和组织农场主从事水土保持工作，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也正是沃斯特所批评的。联邦政府的各项治理工作中确实存在着邦尼菲尔德所谈的一些缺陷，但以此为据就断言存在一个针对沙尘暴地区居民的阴谋却有些武断。

邦尼菲尔德的考察视野比沃斯特宽广，把整体的经济形势、政府的具体治理措施等纳入沙尘暴问题中来，

皆南北之通途，本河湟之锁钥，为古今之驿道”。^①明正德以后，贵德峡成为西海蒙古进入西宁卫的重要通道之一，“归德州峡，城南一百里……自正德十年（海）虏

但其生态学意识不及沃斯特深刻。二人都未对沙尘暴爆发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提出质疑。沃斯特批判的生态价值观发源于这种经济制度，邦尼菲尔德所谈论的机械化技术最终能否造福于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同样取决于这种经济制度。二人都不满意联邦政府治理沙尘暴的措施，联邦政府治理沙尘暴的主导思想是资源保护主义，着眼于开发利用，并未有力地贯彻具有生态学意识的政策；它在治理沙尘暴时并未充分调动农场主的积极性，因此取得的成就很有限。

沃斯特和邦尼菲尔德从不同的视角阐释了沙尘暴，这意味着在研究环境史和探讨环境问题时，应该把它置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多元维度中去考察，它不只是生态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

[注釋]

①④⑤⑥⑦⑧⑨⑩⑫唐纳德·沃斯特著、侯文蕙译、梅雪芹校：《尘暴：1930年代的美国南部大平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9页、第110~111页、第14页、引言第6页、第121页、第27页、第221页、第233~238页、第264页。

②③ R. Douglas Hurt: *The Dust Bowl: An Agri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Nelson-Hall Inc 1981, p18.

^⑪Gifford Pinchot: The Fight For Conservation,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10, p 48.

⑯⑰⑱⑲⑳⑭⑮⑯⑰⑱⑲⑳ Paul Bonnifield: «The Dust Bowl: Men, Dirt, and Depression»,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79, p 41, p41–46, p49–51, p51–52, p46–49, p87–105, p 69, p106–184.